

報苑耕耘

——
马达自选文集



文匯出版社

耕耘苑報

樣初題

馬達自选文集



(沪)新登字303号

责任编辑: 沈国祥

封面装帧: 赵文奎

报苑耕耘

马 达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1992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70,000

印数: 1—2000 印张: 10.375

ISBN 7-60591-182-X/G·106

定价: 4.50元

作者简介

马达(1925.2——)回族。安徽安庆人。新闻记者、新闻评论员、高级编辑。1941年2月去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进行组织地方武装和民运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开始，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主要是办报。解放前，先后担任苏中《滨海报》、《苏中报》特派记者，《群众报》记者、通联科长，新华社苏中二支社(高邮分社)副社长，《人民报》总编辑，华中《新华日报》地方版主编。解放后，历任《苏南日报》副总编辑，苏南《工人生活报》编委会书记，《劳动报》总编辑、社长，《解放》杂志评论员，《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现为《文汇报》社顾问，上海新闻学会会长。

他在五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曾参加和领导九张报纸工作，并在五张报纸中担任总编辑，共达二十二年，写过大量新闻、通讯和评论文章，对办报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他从五十年代起，结合办报实践，参加新闻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教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并带硕士研究生。他撰写的百多篇新闻理论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地新闻杂志上，《对三个问题的思考》等论文收入《新闻论文集》等书中，《新闻的指导性》一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奖，另著有《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一书。

在八十年代，他曾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和应邀先后访问芬兰、挪威、联邦德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



作者近影



作者一九八七年在《文汇报》时摄。

作者一九六五年
在《解放日报》时摄。



一九四九年渡江前
夕摄于苏北。



作者(中)一九四三年在苏中解放区
前线采访时摄。

目 录

五十年九张报.....	马 达 1
——记我的办报生涯	

上 编

有感而发话办报.....	29
关于新闻和信息问题通讯.....	37
社会信息需求和报纸沿革.....	42
《文汇报》新闻改革的实践.....	46
《文汇报》新闻报道的性格.....	51
独家新闻、人物新闻.....	55
谈“读者需要”和“共同兴趣”.....	66
报纸的基本功能和“三个面向”.....	69
指导性在新闻内涵之中.....	75
努力在新闻写作上创出特色.....	82
使新闻具有更大吸引力.....	87
增强评述性新闻思辨色彩.....	91
重视新闻的处理方式.....	95
新闻的信息和信息报.....	102
正确反映和引导舆论.....	105
党报要坚持党性原则.....	112
善于策划第一着.....	125
谈《文汇报》的发展战略.....	128
评论是报纸的“眼睛”.....	139
努力创新 办好专刊副刊.....	143

给编辑同志的一封信	149
贯彻“双百”方针甘苦谈	152
要闻编辑是创造性的劳动	162
对报纸上“大特写”的议论	170
发扬“文汇精神”、“文汇风格”	178
面对挑战,更要锐意改革	183
报社内部改革要提上议程	189
发挥新闻摄影独特功效	194
把思想政治工作活跃起来	198
善于经营管理是一门学问	202
加强新闻理论研究的意见	205
首先是思想内容的改进	212
新闻改革如何引向深入	221
庆祝《文汇报》创刊五十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32

下 编

万盈乡实行新乡制前后	241
溱潼西边城的反顽斗争	245
记七灶河战斗	249
参军热	252
接敌区某乡的民兵	255
瞎子和田	257
邵伯保卫战	260
半边裤子	264
扁担兵和扁担连	268
麾村的欢笑	269
劳动人民为什么能忘我劳动	271
钳工李福祥的创造	278
高尚的人,坚毅的人——悼念魏克明同志	285

打开“绿色金库”.....	291
海上巨人.....	294
“白城”漫步.....	297
宁波港和宁波人.....	300
美国知识界的“中国热”.....	303
在美国家庭农场作客.....	306
重视“学术环境”的创造.....	309
参观黄河风景区引起的思索.....	311
为企业家立传.....	314
执笔一生，不求闻达——怀念蒯斯勋同志.....	317
非同寻常的四百天.....	319
珠海人和黄金海岸.....	322
热烈的冰雪效应.....	325

五十年九张报

——记我的办报生涯兼作本书之自序



岁月如流水，有时滔滔，有时曲折，有时潺潺地流过。回顾我自踏上新闻工作岗位至今，已过去了50个年头。回首前尘，有许多感慨涌上心头。

有些同志曾多次询问过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我都没有回答。原因不是别的，主要是在紧张繁忙的报纸工作岗位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想过去的事。现在退居二线，广视野变成窄视野，快节奏变成慢节奏，忙碌变成空闲，自己的往事象放映旧影片一样，断断续续地重现在眼前。

我投身于新闻事业，有一定的偶然性。我走过的道路，和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也不尽相同。我原是初中学生，从未进过新闻专科学校，也从未有过想当新闻记者的追求。回想起来，我的新闻生涯的开始，是平凡而又不显眼的。在民族危难、抗战烽火四起时，16岁的我，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当年参加了共产党。那时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刚开辟，我在地方武装部队做政治指导员，在农村做民运工作，又在黄海之滨做渔民工作。由于我曾为新四军部队办的报纸——《抗敌报》写过地方武装的战报，农村组织抗敌协会的情况，虽然那时我对什么是新闻这类起码的问题也回答不出来，但1942年初组织上还是把我选派到将要创办的《滨海报》当记者。从报纸的通讯员到报社的记者，这是我踏上新闻工作

岗位的第一步。

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在新闻领域的实践，主要是办报。

办报，对我来说，不仅是组织上分配的一件革命工作，一种社会职业，而且是我长期来了解社会、学习社会而又联系社会的窗口，是我多方面地进行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探索的园地，也是我广泛吸取知识营养，增长才干的新闻大学。

的确，我对办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特殊的爱好，我的大半生就是和各种报纸一同度过的。

我清楚的记得，在那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在海边稀稀点点的盐灶旁，紧张的行军后架起天线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点起豆油灯编写稿件；在水网地区芦苇荡中的小船上，一面监视着下乡“扫荡”的敌人，一面印刷报纸；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无数个日月的夜班中，看到出色的稿件和标题，禁不住大声嚷嚷，拍案叫好；在连续熬夜的情况下，一天深夜编辑要我签发大样，我在睡梦中将毛笔在帐子上写下“印”字，被传为笑谈……

几十年岁月，我从办油印报、石印报到铅印报，从办通俗小报到大型日报，从办工会报到党委机关报、面向知识分子的综合报纸，先后参与的有9张报纸。办报，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门综合艺术，我对誊写、油印、校对、发行到编辑部各方面业务工作都干过或参与领导过。我17岁做记者，脚穿自己结打的线草鞋，背着小背包，到农村蹲点，随军到前线采访，到敌后边缘区活动，并较长时间负责培养工农通讯员和联系记者的工作。从23岁起，担任报纸的总编辑，先后在5张报纸担任过总编辑工作，时间累计有22年。

我的新闻生涯是和办报分不开的。我在这所新闻大学里，学到不少东西，也尝到许多甜酸苦辣的滋味。这中间，有不少是至今仍激动不已的回忆，也有一些是难以弥补的遗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经历：从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一名新四军战士，到一名新闻记者，报纸的总编辑，是党和人民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是在实践中学

习、又在学习中实践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

独轮车上的报社

1941~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刚刚开辟的苏中解放区，处于坚持敌后斗争的十分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向苏中解放区发动一次又一次“扫荡”、“清剿”、“清乡”，抗日根据地被一块块分割，苏中军民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开展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党需要宣传、组织群众，人民需要引导、鼓舞，苏中区党委决定二分区创办《滨海报》。年轻的我第一次参加报纸工作，初步学到党报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我们刚建立不久的《滨海报》社，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经常长途行军，在行军后的空隙抓紧出报。刚创办时，全报社9个人，象一个战斗小组那样工作，总编辑兼做编辑，编辑、记者也兼做誊写、发行等工作，还帮助翻译电讯稿。为了把报纸编好、印刷好，大家抢着干工作，抢着干又苦又累的活，团结得象一家人。我做记者，也参与写钢板，兼发行工作，是大家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全报社的主要资料，都放在一部木制的独轮小车上。炊事员兼通讯员老罗是“车长”，他是本地人，长得又高又大，我们都叫他“大个子”。独轮车上放着印刷用的白报纸，电台用的电池，粮食和炊具。报务员身上背着收报机，我们每个人身上除背包外，还有米袋、印刷工具、书籍，一支步枪和手榴弹。太阳一落山，靠近东海边的盐场和农村，就会隐隐约约看见一部独轮车和一队人在移动。深夜，又会在远处看见偏僻的茅屋里点着油灯，几个人忙碌地收听电讯、誊写和印刷报纸。天亮后，把这些印好的报纸交给隐蔽得很好的交通站，由化装的交通员送到各个乡村。

当时的报纸，除报道区党委和二地委重要活动和决定外，主要内容是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战报，以及苏联红军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战报。新闻的主要来源是延安新华社广播，因此，我们到驻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忙着架设天线，使报务员能马上

开始工作。晚上，大家围坐在电台旁，等候收听到重要电讯。一有捷报，马上翻阅资料，绘制地图，编写说明，迅速进行编辑、誊写、印刷。重大的捷报，是每期报纸的头条新闻，套红印刷，十分醒目。广大干部和农民高兴地叫它“红报”，把报纸作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一次，敌伪军下乡征粮抓丁，农民把“红报”贴在引人注目的大路口，对伪军说：“新四军刚来过，人还不少呢，你看看他们贴的红报吧”，伪军听了吓得掉头就逃。

誊写，或叫写钢板，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编辑部的同志都学着写。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报社无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印刷；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印刷器材极为短缺。我们用以写钢板的铁笔，是用缝衣针精心磨圆，绑在筷子上制成的。没有印刷蜡纸的滚筒，就从小学校里借来一只密达尺改制而成。印刷时动作要轻快、平稳，一张刻好的蜡纸可以印到1000~2000张。老吴是刻蜡纸的高手，他原是机枪手，手上大拇指负了伤，但他读过私塾，会写一手好看的正楷字。我们报纸的字体、标题和编排十分整齐、美观。邹韬奋先生路经苏中解放区时，沿途看到《江潮报》《滨海报》，十分称赞新四军在敌后办的油印报，说这些油印报可与铅印报媲美，简直是件艺术品。我常想，过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发挥创造性，讲究报纸的编排，使它吸引广大读者，今天有良好的印刷条件，难道不应该把报纸编得更加丰富多彩么！

说到油印报，还有一段插曲。一天，苏中军区介绍来一位日本人，名叫畑田作造，说是来帮助我们搞油印印刷工作的。当时，我国使用的油印机、蜡纸，许多是日本产的“掘井”牌，因此，人们误以为日本人都会油印技术，其实这是想当然的事。畑田是北海道渔民，个子较矮，嘴上镶了四颗金牙，不大爱说话。他是在获港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经过教育后，自愿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报社党支部分工，由我去做畑田的工作。畑田不懂印刷，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几句，我和他相处的好几个月里，每天教他认中国字，读我军战士用的《政治课本》，夏天和他一起睡在海滩边的船板上，冬天一起拾柴烤火，

象亲兄弟一样。他身体健壮，报社有什么重体力活，他都抢在前面干，平时他帮大家淘米、洗菜，拉车和卷报纸，晚上还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他出身贫苦，憎恨日本军国主义，不久由日本反战同盟总部派回到日本工作。50年过去了，不知畑田君现在何处？他常用带有日本腔的中国话对我说：“我爱《滨海报》”，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耳边……

“你是人民的记者”

铅印的《苏中报》创刊，已是1943年。随着油印、石印的《滨海报》的结束，我被调到《苏中报》担任特派记者，并参加了创刊的一些筹备工作。《苏中报》三个字是苏中报社长、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写的。为了制成铜版，特地通过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制作好铜版，又从海上运回来。报社印刷厂的旧式对开印刷机，使用时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启动的问题，由于没有电，无法转动。后来大家动脑筋，搭起一个大木架，装上葫芦和大齿轮，由4个人轮班用力去摇，终于把机器正常开动了。报社领导要我负责校阅创刊号的报纸大样，我赶到十几里外的印刷厂驻地，从小样一直看到清样，从第一版的创刊词看到副刊，心里充满喜悦。

随着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苏中报》的出版比较正常，发行渠道也比较畅通。报社内有一批从上海和其他蒋管区来的文化人，文学翻译家林淡秋、蒯斯勋、金人和从皖南来的木刻家赖少其等，分别担任报社各方面领导工作。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记者，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在《滨海报》时，我只能写出几百字的新闻，由于报纸油印，篇幅小，从未发表过较长的通讯、特写。《苏中报》铅印，对开四版，容量大大增加了。由于我年纪轻，干劲十足，背着背包和挎包，脚蹬线草鞋，四处采访，有时一天一晚跑上百十里路，有时跟地方武装和民兵到敌人碉堡前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有时和民运工作队队员进村访贫问苦。白天奔走，晚上伏在油灯下写稿，几乎忘记了疲劳和休息。

我较多时间是担任《苏中报》驻二分区特派记者。我把各县、各区的交通站作为联络点，今天到这里采访，明天到那里采访，写了一些战斗通讯、农村通讯、调查报告、人物访问记等等。我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全分区不少干部都认识我，我和他们一起谈工作情况，谈报道题材，谈学习心得，结成知心朋友。到各县去，县委开常委会，记者列席参加，会议结束时有一个固定的议程，讨论最近一段时间的报道计划，因为县委就是一个中心通讯组，县委书记是通讯组组长。在开干部会议时，大家汇报情况，记者也介绍自己了解的情况，还作关于党报通讯工作和发行工作的发言；会议中间休息时，我还和大家一起唱抗战歌曲和地方小调。在随部队出发作战时，我和连队干部在一起，充当临时的指导员，帮助他们做一些政治动员工作。我虽是新闻记者，但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民运工作者，一个连队指导员，一个农抗会委员……。许多同志见到我，小小的个儿，嘴巴不停地问，不停地讲，亲昵地用苏北话喊：“马达（斯卡），你来啦。”那两年的记者生活是紧张的，愉快的。我一年只回到报社一、两次，绝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在连队，在基层单位，长期住在农民家里。我从未想过新闻记者应该如何如何，要写出什么惊人之作，我的思想感情，我的愿望，我的采访写作，如同其他干部和农民、战士一样，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抗战而工作，为抗战的胜利而斗争。

有一件事是难忘的。一天，我从农村回到报社，《苏中报》副社长、区党委宣传部长俞铭璜碰到我，说你们只往下面跑，师部、区党委机关也有新闻呀，说着就拉我一起去见粟裕师长。一进门，见到粟裕师长在客堂间正和参谋谈话，看到我们进来，连忙招呼我们坐下，俞铭璜说，粟师长，我带新闻记者来看你，要你讲点新闻啊。粟师长穿着从战场缴来的黄皮茄克，下身穿着军裤，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他上下打量了我，对我说你这位记者好年轻啊，我没有什么新闻好讲哇，说着站起来，走到身背后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前，对我们讲了当前苏中敌我斗争的军事形势，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

我头也不抬，拼命地做记录。粟裕讲完后，笑呵呵地说，欢迎记者同志常到我这儿来，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嘛。他又说，“现在，党的主张，人民的利益，就是要争取抗战的胜利，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你们新闻记者，要做推进抗战的记者，做人民的记者。”在告别粟师长回来的路上，我细细思量粟师长的谈话，同时也懊丧不已，怎么听了粟师长的讲话，竟忘了准备好想要提出的几个问题呢。

工农通讯员运动

《苏中报》由东台转移到宝应以北，我留下参加办《群众报》，后改为《江海导报》，不久又调到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办《人民报》。这一时期，我负责组织工农通讯员运动和领导记者的工作，但我仍不忘自己是记者，经常下去采访。

全党办报，是我们党领导的报纸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蕴含着极其生动丰富的内容。在敌后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各级党委都建立通讯组，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自愿担任报纸的通讯员。在报社经常转移的情况下，通过各地的交通站，每天收到大批工农通讯员的来信来稿。这些信稿，有的是用小学生在私塾写大楷用的仿纸背后写的，有的是用店铺用过的记账本的反面写的，有的是用记事簿上撕下来的小纸片写的。这些来稿来信，字迹歪歪斜斜，有大有小，内容也多种多样，有新闻，有战报，有民谣，有墙头诗；有表扬稿，也有批评建议，还有些是剪纸、绘画。也有一些通讯员是初次写作，要求报社编辑帮他改正错别字的。面对这么多稿件信件，我每天要看几十件，许多作者我在采访时见到过。我清楚的知道，这些不久前还是农民的干部，写下这几十、几百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啊！每个字的背后，都倾注了他们对抗战事业的热忱，对党报的热爱，我和做通联工作的同志们订下规矩：凡是工农通讯员的来信来稿，每件必复，每稿必退，每月在报纸上公布通讯员来稿情况，每年表扬一批工农通讯员。当时根据地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我们参加开荒种地，纺棉纱，一个月极少的津贴和菜金也常常发

不出，因此对通讯员的写稿件是谈不上发稿费的，唯一的奖励，就是凡报上发表了稿件，都寄给作者几张油印的稿纸。通讯员拿到这几张稿纸十分珍贵，不肯轻易用它。对编辑部寄回的退稿信、修改过的稿件，也认真保存下来。报社编辑记者和通讯员之间，这种深厚的感情，亲密的友谊，现在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恐怕不易体会得到的。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至今在我脑海中还经常浮现出十几位工农通讯员的形象。兴化县陈桥乡乡长陈日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扫盲后识字不多的农民，也是乡里读报组组长，《群众报》和《人民报》的通讯员。有一次，我出外采访时住在他家里，一清早，看见他连挑十担粪下田，然后去乡政府工作。日落，他又拎起水桶，挑上七八担水泼在粪池里。晚饭后，点起小油灯，拿着一支铅笔，不断舐着嘴唇，埋头一个字一个字地为报纸写稿。他告诉我，前方打仗，后方要多增产粮食。由于支前任务重，一大批青壮年上了前线，积肥少了，地力减退，他主张要发动每户农民在粪池上加盖子，以保持肥力，这是既简便又有效的增产措施。我听了认为他这个想法很好。怎么写呢？他笑笑说，我琢磨着，写一首车水锣鼓五句半的积肥加盖小调，让大家都唱起来，做起来。写这篇三百多字的稿件，他整整琢磨了两个晚上，一边哼着曲调一边写，写不出的字画个圈，要我帮他填上。看到工农通讯员写一篇稿件时那种认真、执着的劲头，真令人感动。这篇稿件在报纸上发表后，在广大农村影响很大，后来，在粪池上加盖，做为农抗会的一件工作任务贯彻执行。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写稿，在今天可能已很少，有人也许会不屑一顾，但在当时，许多工农通讯员写稿，都是从实际出发，很注重运用党报的。我在农村采访，收集了不少民谚民谣，也写过农民爱读的小调、连载故事等等，对农民读报的要求和兴趣是比较了解的。许多通讯员通过写稿，增进了学政治、学文化的兴趣，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进步很快。陈日昇不久就被选拔为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可惜以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抗战时期，在敌后，战斗频仍，地区分割，报纸发行量小，但报